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位置”與“資本”：側評黃錦樹、任佑卿兩篇有關台灣文學史的論文

doi:10.6752/JCS.200603\_(2).0009

文化研究, (2), 200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006

作者/Author：張誦聖

頁數/Page：292-29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位置」與「資本」： 側評黃錦樹、任佑卿兩篇有關台灣文學史的論文

張誦聖

兩篇都是思辯嚴謹、論理確鑿的論文，不僅對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任文稱國族主義）和文學史寫作之間的糾纏關係有犀利的剖析，尤其是藉著拉大時空座標，替台灣文學史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對照框架。黃錦樹從華人移民社會的角度，比較近、現代馬華文學和台灣文學發展途徑的結構性雷同，頗具說服力地點出不管是以中國民族主義、還是台灣民族主義為依歸的台灣文學史觀都沒有正視的一個歷史可能性：紛擾一時的「在地化」與「回歸」之間的拉鋸，和左右無數個人命運情感的「分離」或「統一」大業，既然是此類社會裡反覆出現的通象，再激烈的運作可能都只是一廂情願，無法使當地的文學史擺脫「無國籍」的宿命。任佑卿的討論則一路指向一個富有後結構理論色彩的定理陳述：國族界限在根本上就是極其模糊與不穩定的，並且不斷地被修正及重新劃定。未了更聲稱：眼下全球泛華人社會裡，一個巨大的「中華國族共同體」的想像正在迅速滋長；它與台灣內部建設一個新國家的努力，表面上互相對立，其實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所激發的各種文化敘事（包括文學史），皆體現出「重新劃定國族界限的意圖」（頁278），同樣具有「從反面證明，國族界限的不穩定和過程性」（頁278）的效果。

兩位學者使用擴大視野、轉換焦距的方式，的確能夠有力地凸顯當下許多台灣文學史（或類文學史、準文學史）寫作的局限。然而，此間民族主義引發的問題所以棘手，正是因為它超越學理的範疇。它龐大的力道不僅穿透公共論述領域和學術體制，對文學活動的整體機制產生制約，並且透過想像、信念、慾望、和意志，左右從事者的情感動機，直接影響到個別學者的推理模式。無怪乎兩位作者在

知識層面上力辯之餘，皆將矛頭指向參與台灣文學史寫作及論述活動的「人」。是這些個人或群體參與者甘願效忠、或無法超越特定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才會有黃文所詬病的「文學台獨」行動綱領（「即使文學率先宣布獨立，自封台灣民族文學，也難免自欺欺人，本質上仍然無國籍」（頁240）），或是任文所謂的「有意識的盲點」（即便像陳芳明和邱貴芬這樣關心邊緣化少數族群（包括女性）的開明學者，也因爲個人「傾向於台灣國族主義——新國族創造的夢、想像、和意志」（頁278），而蒙蔽或消弱了他們對「宏大敘事的國族主義」（頁270、278）應有的批判力和警覺心）。因此我也想從「人」的角度，從兩位學者同樣身爲「台灣文學史論述活動參與者」的個別位置（包括學理背景、寫作策略、和情感動機等）來側面評論一下這個問題。

黃文的立足點明顯地有別於任佑卿情感上較爲疏離、更爲集中地關注於學理思辯的寫作位置。即便也充分認知到文學史「完全是一種現代體制」（頁215），其主要功能在於論證建構中的民族國家，黃錦樹卻似乎仍對文學史撰寫抱有相對強烈的慾望和期許——不然不會屢屢感嘆台灣到現在還生產不出一部像樣的、被學術界普遍認可、具有教科書水準的文學史。在這一點上，黃錦樹與許多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地知識分子」一樣，一方面接納後結構主義對文學史的解構性敘述，另一方面卻頗爲吻合「本質主義策略」精神地對文學史寫作賦予厚望（因爲它的確是在全球權力結構中肯定自我存在、取得象徵性平等地位的有效途徑）。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儘管黃錦樹文章裡對他飽受質疑、曖昧不明的「在地」身分（「既在內部又在外部」（頁244）、「雙重的有國或無家」（頁244））多所著墨，卻並不影響他在嚴格定義下的「台灣文學場域」裡佔有顯要位置的事實。因爲如此界定的文化場域所屬成員的資格認證，是最終取決於個人的參與行爲，及其所擁有的相關象徵資本的多寡。從這個角度看，黃錦樹以他作品的質和量近

年來累積了相當高的象徵資本，使他成為「台灣文學史論述主導權」一個重要的實力派競爭者。身兼小說家和學術研究者、積極參與場域內活動、和其他成員對話的次數頻繁：這些自然都有助於累積資本。然而就台灣文學史這個角力場來說，最重要的，還是黃錦樹在幾篇有份量的學術論文裡，結合了豐富的史料和相當高的理論素養，對若干具有挑戰性的關鍵議題——如中國性和現代性——提出原創性的見解和新的分析範疇。這些，在我看來，才是他贏得籌碼、在兩種民族主義之外尋找第三種可能性的努力成果。與之相較，本篇文章雖則也有如前所述的學理價值，然而同時，我們也在行文中看到比往常有增無減的「對話性」情緒語言。顯然，作者與場域內其他成員角逐論述主導權的意味濃厚。這種論戰性格不免有窄化議題的危險：一方面聲稱要把文學從民族國家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面卻仍以文學史的「國籍」作為辯證焦點；所標幟的「第三種可能性」似乎已經先天上被對手的分析範疇所框限（或綁架）。

黃錦樹文章的風格明顯受到他作為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分的影響。當前的台灣社會裡，學術與公共論述領域之間重疊性頗高，無疑是書寫傳統嬗變及眼下政治情勢交互作用的結果。從國外看來，這種文化生態下所孕生的一種融合學術與創作屬性的文類，表現精采，感染力強，十分令人矚目，幾乎可視為一種當地特色。然而，台灣文學研究自從90年代中期進入學術體制以來，不可避免地逐漸被納入專業的軌道（現代化規律使然？）。未來學術與公共論述之間更為涇渭分明的「文類區隔」，會對這種特殊的寫作成規產生何種影響呢？

無論如何，在趨勢更加明朗之前，我個人仍然十分珍惜黃錦樹在這個文類裡傑出的表現，並且會持續我在欣賞之餘，努力濾出具有學理意義論點的閱讀習慣。

任佑卿的非華人身分大約可以解釋她對台灣文學史本身較低的感性投入，以及她對研討對象相對純粹的學理關注（如文章裡對「國族

界限的不穩定和過程性」這樣一個定則的戮力闡發）。然而任何論述行為都免不了涉及個人或群體在象徵資源分配過程裡的位置。鑑於任文展現的若干特色——如後結構知識論、基進意識形態、後現代行動主義等——我們或可將作者視為近20年來茁壯的「新興跨國知識論述群體」的一員。

任文的主要參考理論框架之一，後殖民論述典範，一向頗得這個論述群體的青睞。它強調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殖民或準殖民關係下，西方文化霸權的無所不在（尤其是透過複雜隱微的文化政治，在非西方社會的集體無意識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包括不受事實檢驗的「文化自卑」），相當程度上改寫了先前冷戰時期以「資本主義民主國家vs社會主義共產政權」為主軸的全球性論述。然而，後殖民論述在處理不曾直接被西方殖民的東亞地區時，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同時，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豁然邁進一個新階段，席捲全球，並導致中國大陸由「左」至「右」的戲劇性翻轉。這些使得兩種截然不同的現代化典範（「資本主義現代性」vs「社會主義現代性」）重新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同時又多加了跨國性、全球主義的複雜考量。

任文第二節標題「後殖民主義、冷戰、離散」說明她試圖兼顧後殖民、冷戰、全球論述的理論框架。不過，我個人感到，文章裡對後殖民論述的基調似乎體現得更為徹底些。這在檢視夏志清的寫作脈絡上格外明顯：從東西不平等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來，戰後流寓美國的夏志清以英文撰寫現代中國小說史，是「成功地完成了作為國際公民向第一世界提供第三世界的文化資訊的作用」（頁263）；而書中「對張愛玲的高度評價，我們將其看成是東方人對自我的自卑感做出的無意識補償和治癒也無妨」（頁264）。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分涉及了二十世紀中期以降，進入美國學術界裡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佔有的特殊位置，是一個台灣讀者不太熟悉（或許也不甚關心）的領域。這個位置在夏志清小說史出版

後的2、30年間發生突變，竟然成為批判西方霸權的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溫床，並產生了從西方前殖民地出身的，諸如薩伊德、史比娃克(Gayatri Spivak)、芭巴(Homi K. Bhabha)、周蕾等後殖民論述學術明星。如果將這個學術系譜納入考量，或許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質疑：基於後殖民論述的產生途徑在某種程度上必然規範了它的對話對象、應用範疇、和價值判準，用它處理來自另一種原鄉背景、冷戰時期與張愛玲同具華人離散身分的夏志清時，是否有失之片面之虞？

同樣的片面性在任文討論張愛玲現象的部分也一度出現。「如果沒有冷戰，就不會出現後來在1980、90年代轟動大陸和台灣文壇的張愛玲現象，她或許就此永遠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頁261)任何歷史事件無疑都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張愛玲所以一再成為邱貴芬所謂的「超級符號」，華人媒體炒作的焦點，無疑有它的內在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和華人社會循資本主義模式現代化，在二十世紀不同年代崛起的都會裡（上海、香港、台北、上海）所形成的流行文化產業的特質有密切的關聯。換句話說，張愛玲現象的確是可以冷戰分析框架來理解的，只是這個詮釋不應被窄化、局限在張本人和美新處之間的交易、和把她提升到高層文化的夏志清的反共意識形態之類的歷史偶然之內。

與黃錦樹文章所代表的、局內人所偏好的散文式學術寫作相較，任文對議題有更加明確的界定，理論預設清晰，思辯性強，是很好的學術論著典範。然而往往對不屬於預設範圍內的紛雜史實作過於清楚的切割，呈現另一種性質的局限。就以任文對陳芳明和邱貴芬的台灣文學史論述盲點的批評來說，推理無瑕，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卻難免有將文化場域內的生態因素簡化之嫌。我個人仍然傾向於用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身分之間的內在杆格來解釋這個現象。或者我可以引申蕭阿勤先生的一個論點——大意為「台灣民族主義是在後現代歷史狀況下所從事的一項現代性志業」——來總結我的側面性觀察：

過去十幾年間，台灣菁英學者與跨國知識論述圈接軌，在專業崗位上傾向於接納、認可後現代知識論、後解構認知模式。然而此時恰逢現實政治裡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競爭趨於白熱化之際，現代性的國族打造事業吞噬了公共領域裡的各種象徵性和實質性資源，成為身兼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者們不得不親身與赴的一個戰役。這兩者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或許正是快速現代化的東亞社會所共同經歷的巨大時空壓縮的徵候之一吧。